

古籍校勘 说略

GUJI JIAOKAN SHUOLUE

■ 曾贻芬 崔文印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古籍校勘 说略

■ 曾贻芬 崔文印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籍校勘说略 / 曾贻芬、崔文印著. — 成都: 巴蜀书社,
2011.1

ISBN 978-7-80752-747-3

I. 古… II. ①曾…②崔… III. 古籍整理—研究—中国
IV. G2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59553 号

古籍校勘说略

曾贻芬 崔文印 著

责任编辑	张玉亮
封面设计	张 科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 (028) 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 (028) 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成都翔川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175mm×250mm
印 张	22.375
字 数	400 千
书 号	ISBN 978-7-80752-747-3
定 价	3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弁 言

这部《古籍校勘说略》共收文三十八篇，其中“研究编”十篇，“相关知识编”六篇，“新刊古籍评介编”二十二篇，都与古籍校勘有关。这部书可视为我们在中华书局出版之《籍海零拾》的姊妹篇。

在古籍的界定问题上，我们忘不了白寿彝先生对我们的教诲。他说，历史上不可能存在那么一条线，说某天以前是古籍，而某天以后就是今籍，这种刻板的、僵化的说法，既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也有悖于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理论。同时，传统文化本身还有个延续性和继承性问题，这是任何“线”都难以断然分开的。我们虽然努力按照白先生的指教作了表述，但因我们的水平有限，很难领会得十分准确，也很难表述得比较恰当。不妥之处，仍望方家指正。

编这部书还让我们想起了赵守俨先生。记得有一天我们查《三国志人名索引》，却查不到曹操儿子曹整的名字。后来发现，这个索引居然把曹整改成了“曹子整”，于是我们作了多方查证，并写了篇小文，因没有把握，想请守俨先生看一看。守俨先生不仅连夜看了这篇小文，第二天一早就托人带还了我们，而且还为我们提供了这一错误的渊源，并分析了标点本所以致误的原因，令我们十分感动。今把守俨的这些附言一并附在《曹子整探微》一文之后。附言虽寥寥数语，却至今仍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守俨先生待人的热诚之心，这是我们永远不能忘怀的。

陆游《家世旧闻》所附景钞六砚斋写本李盛铎跋“段得景”标点之误，是启功先生首先发现并很快告诉我们的，希望再版时予以改正。启功先生在言谈之中，充满了对出版社、对点校者孔凡礼老先生、对责任编辑的关爱之情，这也是我们终生铭感难忘的。

编旧文，触往事，感慨良多。尤其是白寿彝先生、赵守俨先生、启功先生均已作古，谨在这里向三位可敬的长者表示深深的敬意和怀念。

古籍校勘是一项艰难、复杂的文化工程，在我们这个有五千多年文化积累、古籍浩如烟海的文明大国，这项工程尤其显得重要。我们所做的一点点工作，只是这项大工程中的沧海一粟。不妥之处，仍望读者不吝赐教。

曾贻芬 崔文印

二〇一〇年八月二十六日于北京京师园

目 录

弁 言	(1)
-----------	-------

研 究 编

关于古籍整理的一些问题	(3)
说“校勘”与“校对”	
——谨以此文祝贺来新夏先生八十华诞	(15)
说校勘四法	(28)
论“择善而从”不是校勘的普遍原则	(39)
古籍的注释及今译	(51)
关于古文今译	(94)
古代史书的整理与审读	(103)
宋至清历朝官方古籍整理考略	(142)
谈古籍的标点及其他	(161)
整理或影印古籍要注意保留原书的序跋等附件	(164)

相关知识编

版本学	(169)
目录学	(176)
校讎学	(184)
校勘学	(188)

再说校勘学	(194)
三通学	(232)

新刊古籍评介编

《金史纪事本末》出版说明	(271)
《辽史纪事本末》出版说明	(274)
《宋刑统》	(276)
宋代社会矛盾的缩影	
——《名公书判清明集》	(278)
《靖康稗史笺证》评介	(281)
关于《汉书·昭帝纪》中的一个句读	(285)
博采众长 详而不滥	
——读点校本《唐律疏议》	(289)
“曹子整”探微	(292)
茫茫书海费搜寻 为注清波苦用心	
——读刘永翔《清波杂志校注》	(295)
从“段得景”想到的	(300)
说点校本《云麓漫钞》	(302)
说点校本《汴京遗迹志》	(306)
一丝不苟 精益求精	
——点校本《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出版	(309)
三代学人的劳动结晶	
——读《大金吊伐录校补》	(312)
读点校本《杨园先生全集》	(316)
《南部新书》点校商兑	(321)
读《东京梦华录笺注》札记	(327)
读书献疑	(332)
毫厘之间的思考	(335)
《儒学警悟》影印说明	(339)
《知不足斋丛书》影印说明	(344)
《藕香零拾》影印说明	(351)

研 究 编

关于古籍整理的一些问题

一 什么是古籍

谈到古籍整理，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古籍？这似乎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但作为一个比较科学的概念，要把它讲清楚却不十分容易。不错，古籍，简言之，就是古代的典籍。但这个“古代”包括的时限如何？它的上限起于何时？它的下限如何确定？这些都颇值得研究。即以古籍的时间下限而论，目前至少有三说：一是一八四〇年说，二是一九一一年说，三是一九一九年说。持第一说的同志认为，鸦片战争揭开了我国近代史的篇章，故鸦片战争以前的典籍应称作古籍，鸦片战争以后的书就不应称作古籍了。持第二说的同志认为，辛亥革命推翻了我国两千年来的封建帝制，故辛亥革命前的书可称作古籍，辛亥革命以后的书便不应称作古籍了。持第三说的同志认为，“五四运动”是我国新旧文化的分水岭，故“五四运动”以前的典籍应称古籍，“五四运动”以后的典籍便不应称作古籍了。这三种说法，究竟哪一种更可取呢？笔者认为，古今典籍的分界，既和历史的分期有联系，又和历史的分期有区别。说它有联系，是因为，一定的文化，毕竟是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的反映；说它有区别，是因为，一方面，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以及反映这一新社会制度的新文化，必然要孕育于旧的胚胎之中，另一方面，旧的文化，亦不能随着旧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的消失而立即消失。从这个意义出发，我以为，我国古今典籍的分界，应该包括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一整个的历史时期。在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随着中国人民的不

断觉醒和革命斗争的不断深入，古今文化便渐渐有了明显的区别，大体到“五四运动”以后，新的文化便占了主导地位。虽然如此，但是我们不能够说“五四运动”以前的典籍都是古籍，因为这显然忽略了我国自鸦片战争以后政治、经济，尤其是文化、思想方面所起的新的变化；然而，我们也不能仅仅认为鸦片战争就是古今典籍的分界线，因为这同样忽略了鸦片战争之后我国新旧文化长期并存的事实。勿庸讳言，在鸦片战争之后，大量的典籍，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应属古籍的范畴。因此，要认真找出我国古今典籍的分界来，重复地说，这个分界只能是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一整个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中，相当一部分典籍似属古籍，也有相当数量的典籍可并入“今籍”，这需要从内容到形式作具体的分析才能确定。笔者以为，这种新旧交错的现象，是符合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的。

至于古籍的上限，最早的记载是《尚书·多士》：“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但这些典籍流传下来的很少，故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虽然如此，但姑以《多士篇》的记载作为古籍的上限，估计不会偏离实际太远。

确定了古籍的时限，我们就可以总结出古籍的基本特点：（一）我们现在说的古籍，主要是指我国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所遗留下来的典籍。（二）这些典籍主要是用汉语写成的，但用的是古汉语，即文言文。（三）现存这些典籍的外在形式尽管多样，但主要是线装书。（四）这些书多是雕版或石印，也有一定数量是手抄本。

说到这里应该强调，古籍是一个、也仅仅是一个在一定历史时期的概念，因为随着历史的推移，古籍的下限亦将随之下移，古籍的数量亦将不断增大。古人有云：“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这话虽不一定完全正确，但就古今变化而言，还是没有说错的。

那么，我国的古籍究竟有多少呢？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回答。就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典籍而言，真可谓浩如烟海，无法确计。但就目前现存的古籍而言，虽没有精确或较为精确的统计数字，但据有关书目的记载，还是可以推出个大概来的。首先，清修《四库全书》，据《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共收古籍近三千五百种，存目近六千八百种，虽与实际情况不免有出入。但总计收书在一万多种应是没有问题的。一九三六年，孙殿起先生编《贩书偶记》，是书“凡见于《四库全书

总目》者概不录”（只有名同卷数不同者例外，见该书凡例），收书亦在万种左右。一九八〇年，经有关同志整理，《贩书偶记续编》出版，此书收书至少应在五千种左右。合孙氏二书，共得书约一万五千种。六十年代初期，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收丛书二千七百九十七种，除去重复，共得子目三万八千八百九十一一种。把这些书目的数字加起来，得书为六万四千种左右，除去重复，约为六万种当属可信。除外，我国还有相当数量的地方志，朱士嘉的《中国地方志综录》，收有这类地方志约七千四百多种。再次，释道书和稗官小说，以及石刻等，亦为数不少。特别是宫廷档案，数量尤为可观。把这些再加起来，说我国古籍现存十万种左右当不是夸大之辞。

以前估计我国现存古籍的数目，只以汉籍为准，但这显然是不够的，因为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藏、蒙、满、维等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字，也都有用自己的民族文字写成的古籍。特别是档案，据说拉萨布达拉宫就藏有数量相当庞大的历朝档案。把这些和汉籍加在一起，看来我国的古籍在十二三万种左右是接近实际情况的。这些古籍，是我国古代灿烂民族文化的光辉结晶。尽管两千多年来书籍屡遭厄运，但时至今日，仍有如此众多的古代典籍流传下来，这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这是我们应该引以为自豪的。

二 古籍为什么需要整理

上面，我们谈了我国古籍的大概情况。现在要问，古籍为什么一定需要整理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弄清楚什么是古籍整理。所谓古籍整理，主要指对古籍施以断句、标点、校勘、注释、今译、编选、编集、辑佚等，而断句、标点和校勘则是最基本的。辨伪在某种情况下，可以属于古籍整理范畴，但它本身显然是一种独立的学术研究，它可以与古籍整理有联系，但它在很大程度上与古籍整理有区别，例如某些辨伪专著，当然不是古籍整理，而是有关古籍研究的学术著作。笔者以为，辨伪与目录学似关系更加密切。据说，有人认为，影印也是古籍整理。其实，影印只是一种印刷方法。一部古籍经过整理，是排印、油印、石印、晒兰，还是影印，这仅仅是一个出版方法问题，它们属于印刷技术，而不属于古籍整理。确切地说，只有对古籍施以断句、标点、校勘、注释等等，才叫古籍整理。换言之，只有对古籍的文字施以学术性“加工”，才叫古籍整理，舍此

怎能说是古籍整理呢？不错，影印古籍要给古籍编出页码，一些非善本书影印，还可能对原书不太清晰的字加以描画，但这种工作，只是技术性加工，它和对古籍文字施以学术性加工有原则区别，很明白，它们一属于印刷技术，一属于古籍整理，二者是不能混淆的。有人说，影印古籍，并编了索引，还不算古籍整理吗？回答是一样的：当然不算。因为很明白，编制索引本身并不是古籍整理，它只是为使用这种古籍提供了检索工具，而这种检索工具，它纯属今人的编著，不是对古籍本身的学术加工。中华书局影印出版过《四库全书总目》、《册府元龟》、《文苑英华》等，特别是《四库总目》，还编了索引，但无论如何，它们也不是古籍整理本，可以说，中华书局还没有出版过经过整理的《四库总目》、《册府元龟》、《文苑英华》等。近年来，中华书局一方面影印一批书，以应急需，同时，也在组织人力整理这批书，例如《通典》就是如此，它既要出影印本，又要出整理本。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影印和整理是两码事。影印，它只是采用现代印刷技术，给古籍来个“分身术”而已，它与整理古籍毫不沾边。据说，有人还强调，有些书是经过断句影印的，影印还不算古籍整理吗？这里也很清楚，对古籍施以断句确是古籍整理，但这和它用什么方法出版仍是不同的两个问题。当然，影印可以保存或再现古籍的原貌，比其他印刷方法自有其不可比拟的优越性，但印刷方法毕竟是印刷方法，它与学术性的古籍整理仍是泾渭分明，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前面我们已经谈及，整理古籍的方法尽管多样，但最基本的是断句、标点、校勘，简言之，即所谓“点校”或“校点”。那么，古籍为什么需要点校呢？首先，正如我们在前面谈古籍的特点时已经指出的，就汉籍来说，古籍是用古汉语，也就是文言文写的，而这种文言文，已和今天的白话文有了许多不同。特别是有些古籍，由于时代距今较为久远，其文字更为后世读者所难以理解，不要说我们现在的一般读者，即便像唐代大散文家韩愈这样的文人，也曾感叹过“周诰殷盘，佶屈聱牙”，充分说明，后人读古籍，确实存在着一定的语言障碍。而断句、标点，就正是解决这一障碍的最基本环节之一，只有在这一环节基础上，才能作进一步的注释、今译等等。什么是断句呢？断句就是在文字当停顿的地方，加以圆圈或实心圆点以志之，在读起来停顿而又与下文紧连接的地方，加一顿点以志之。这种方法，古人叫作“句读”，是当时学童启蒙时就要掌握的。新中国建立前，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国学基本丛书》、《万有文库》等，都是采用的这一方法。而标点，则比断句更进了一步，它是用现在通行的标点符号，把古籍的句式、语气等

标志出来。新中国成立前，汪原放曾用这种新式标点标点《水浒传》等章回小说，大获成功。现在整理古籍，一般都采用这种方法，如中华书局整理出版的“二十四史”，就是全部采用新式标点。

除了语言的障碍以外，古籍之所以需要整理，最重要、最关键的还在于古籍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产生了许多讹误。晋代的葛洪就曾说过：“谚曰，书三写，鱼成鲁，虚成虎。”（《抱朴子·遐览》）而在雕版印刷发明之前，书籍就只能靠传抄流行。可以设想，一书岂仅止三写？这样，其在流传中产生的讹误就可想而知了。不要说别的，即以上引葛洪的短短一句话为例，唐代马总《意林》卷四曾引之，“虚成虎”便已作“帝成虎”了。这种情况在古籍流传中极为普遍。《吕氏春秋·察传》记有这样一件事：“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至于晋而问之，则曰：‘晋师己亥涉河也。’”把鱼讹成鲁，把亥讹成豕，这种鲁鱼亥豕式的错乱，在形近或形似的字中是很容易发生的，这是古籍常见的错讹之一。

古籍在流传中，除容易产生上类错讹外，还容易产生衍、脱和“错简”等。所谓“衍”，即是文中混入了不该有的字或词。如“郢人有遗燕相国书者，夜书，火不明，因谓持烛者曰‘举烛’，而误书‘举烛’。举烛非书意也，燕相受书而说之，曰：‘举烛者，高明也。高明也者，举贤而任之。’燕相白王，王大悦，国以治。治则治矣，非书意也”。这本是韩非所讲的一个牵强附会的故事（见《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但在写国书时，因让持烛者举烛，而误把“举烛”二字写入了国书中，则就这封国书来说，“举烛”二字就是衍文，它是在特定的条件下混入正文的，俞樾就曾指出，古籍中有两字义同而衍、两字形似而衍、涉上下文而衍、涉注文而衍等多种类型。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在记蔺相如以计复取回和氏璧之后云：“赵王送璧时，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斋戒五日……秦王度之，终不可夺，遂许斋五日，会相如广成传舍”。王念孙云：“传下本无舍字，此涉《索隐》传舍而误衍也。《索隐》本出‘广成传’三字，而释之曰，‘广成是传舍之名’。若正文作广成传舍，则《索隐》为赘语矣。《太平御览·居处部》引此有‘舍’字，则所见本已误。左思《魏都赋》：‘广成之传无以畴。’张载注引此作‘舍相如广成传’，与小司马本同，足证今本之误。”（《读书杂志》卷二）这便是涉注文而衍的实例，其他多类此。

在古籍中，与“衍”误正相反的情形就是“脱”。所谓“脱”，就是原本有

的文字，因某些原因被漏掉了，致使上下文义不能衔接。例如《文选》卷三七诸葛亮《出师表》有云：“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责攸之、祗、允等，以章其慢。”这里“责攸之、祗、允等”上无所承，即缺“责攸之、祗、允等”的理由，文义不贯，“责”前显有脱文。李善注《文选》时已注意到了这一点，故他引《蜀志》所载《出师表》，证明在“责”前脱了“若无兴复之言”六字，只有补足此六字，文义才能贯通。再如《汉书·高帝纪》记鸿门宴有云：“项庄因拔剑舞，项伯亦起舞。”王念孙云：“案下句言‘亦起舞’，上句‘舞’上亦当有‘起’字，而今本脱之也。旧本《北堂书抄·乐部三》、《太平御览·兵部七十三》、《文选·西征赋》注，引此并作‘拔剑起舞’。《史记·项羽纪》曰：‘项庄拔剑起舞，项伯亦拔剑起舞。’皆其证。”（《读书杂志》卷三）这说明，“因拔剑舞”，的确应作“因拔剑起舞”，这样才能与下文“项伯亦起舞”相对为文，这里显然脱了“起”字，虽未伤文意，但却有损文采。

古籍中还有一种常见的讹误就是错简。所谓“错简”，就是不同程度地搞乱了原来的文字顺序，这和古代把简策弄乱了顺序一样，称之为“错简”，就是借用这个意思。大体而言，“错简”的情况以先秦古籍为多。俞樾说：“凡字句错乱者，寻其文义，移易其一二字，即怡然理顺矣。若乃简策错乱，文义隔绝，有误至数十字者，则非合其前后，悉心参校，不易见也。”（《古书疑义举例》卷六）如《周易系辞传》云，“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之乾坤坤”。俞樾云：“按‘易穷则变’二十字，以上下文法言之，殊为不伦。疑‘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乃上篇‘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以下之脱简。‘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乃文之重出者也。幸此文重出，而烂脱之迹犹未尽泯，可以校正，当移至上篇曰：‘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如此，则文通字顺。不过，这种情况正如俞樾所说，“非合其前后，悉心参校，不易见也”。

先秦以后的古籍，虽然这类错讹较先秦为少，但也有“错简”的情况，如《大金国志》卷四十所载《许奉使行程录》（即宣和乙巳许亢宗奉使燕云行程录）：“第二十七程，自州七十里至兴州。契丹阿保机破渤海国，建为东京路。自此所至，屋宇虽茅茨，然居民稍盛，食物充足。离兴州五十里至银州，中顿，又四十

里至咸州。第二十八程，自兴州九十里至咸州。未至咸州一里许，有幕屋数间……”只要细心阅读，就不难发现，明明第二十八程是从兴州到咸州，却偏偏在第二十七程末出现了“离兴州……至咸州”的记载，殊为不协。显然，“离兴州五十里至银州，中顿，又四十里至咸州”十八字，乃第二十八程的开头，下接“未至咸州一里许”云云，文义方贯。扫叶山房本《大金国志》乃清刻，犹然如此，直到三十年代陈乐素悉心参校这个行程录，才得以更正。

误、衍、脱、错简，这是古籍在流传中比较多见的讹误，但仅这四个方面，还不足以概括古籍中的全部错讹。事实上，古籍中的错讹是五花八门的。如《战国策》中的触蓍，实际应如《史记·赵世家》所载叫触龙，但因无佐证，此字长期与下文“言”字合而为一，直到长沙马王堆帛书出现，这个千年疑案才有了定论。这是把两个字误作一个字之例，还有把一个字拆成两个字的情况。如《礼记·缙衣篇》：“信以结之，则民不倍，恭以莅之，则民有孙心”。据惠栋《九经古义》考证，这“孙心”，实是“愁”字的一分为二。《说文》有“愁”字，释为“顺也”。可见古籍中的错讹是极为复杂的，误、衍、脱等不过是其常见的罢了。

总之，古籍在流传中产生了许多错讹，这些错讹有碍于我们对古籍的使用，有碍于科学研究，因此，我们必须通过整理的手段，尽量把这些错讹订正过来。这里需要强调，整理古籍的目的就在于存真，也就是说，通过整理手段，恢复古籍的本来面貌。古人有云，校书如扫落叶，随扫随生。这说明，整理古籍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即以校勘而论，有些人错误地以为，校勘只是机械地列出“某本作某”。应该指出，只简单地写出“某本作某”，这不是校勘！校勘应该、而且必须判断是非，不判断是非的罗列异同，那是过去藏书家干的事。需要强调，藏书家所以热衷于比勘诸本，列出异同，实在说，他们原意本不在“校”，而在于通过这种罗列，过录一种版本，多一种藏书罢了。但这种罗列异同，毕竟是整个校勘过程的一个环节，它们为进一步判断是非提供了依据。笔者以为，后人称这些藏书家为校讎家而不是校勘家，是十分正确的。因为校讎，这只是刘向校书的第一步，过去的不少藏书家，多是仅仅走了这么一步。重复地说，因为他们罗列异同的目的只是为了增加藏书品种，而不在于古籍整理。现今的不少人，常把校勘、校讎，甚至校对混为一谈，这是十分错误的。

三 古籍怎样进行整理

整理一部古籍，首先需要借助于各种书目，搞清这部书的版本。所谓版本，就今天广义而言，即指有多少种印本、抄本或稿本等等，然后再从中选择刊刻精良、错误较少的本子作底本或工作本。选择底本或工作本，特别是选择底本，是关系这部书整理质量的很关键一步，因为版本不同，往往差异很大。关于这一问题，早在宋代就已引起学者的重视，陆游在《老学庵笔记》卷七记有这样一件事：“三舍法行时，有教官出《易》义题云：‘乾为金，坤又为金，何也？’诸生乃怀监本《易》至帘前请云：‘题有疑，请问。’教官作色曰：‘经义岂当上请？’诸生曰：‘若公试固不敢，今乃私试，恐无害。’教官乃为讲解大概。诸生徐出监本复请曰：‘先生恐是看了麻沙本，若监本，则坤为釜也。’教授皇恐，乃谢曰：‘某当罚’……”这件事，除陆游外，朱彧的《萍州可谈》（卷一）、叶梦得的《石林燕语》（卷八）都作了记载，特别是叶梦得，还评论说，“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这说明，摸清版本，加以选，的确很重要。特别是自宋以后，由于书贾谋利，常以残本割裂原来的分卷来冒充足本，有的虽非残本充足本，却乱删原书的叙、跋，这些都必须在选择底本或工作本时加以注意，选择不当，如明明有足本，却选了残本或不全的本子为底本或工作本，将造成这个整理本的先天下不足，这是决不能吊以轻心的。

那么，什么是底本，什么是工作本呢？底本和工作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谓底本，也可称作蓝本，即是说，将来整理本的文字要基本上以底本为主，或者说，整理本的文字，要基本保有底本的固有特色。工作本则不同，所谓工作，只是为了工作之便，暂时借一本的文字作参照，然后参校诸本。它与底本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整理本的文字并不以工作本为主，而是择善而从，最后整理出来的文字，既非甲本，又非乙本，而是一个兼有诸本之长的新本子。搞清了这二者的区别，我们就可以根据一书版本的具体情况作不同处理。一般说，在诸本之中，凡有一本文字见长者，可采用作底本；相反，在诸本中没有特别好，也没有特别坏的本子，或者说诸本水平差不多，且各有特色，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兼收诸本之长，便可采用工作本的办法。

选好了底本或工作本，接着便要断句或标点。我们在前面已略谈了什么是断